

政治心理学的争辩议题述评^{*}

尹继武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 作为政治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 政治心理学在欧美学界的发展逐步走向成熟。作者详细归纳了政治心理学学科发展史和理论史上的争辩议题, 包括政治心理学与理性的关系问题, 政治心理学的主导范式与分散化关系问题, 政治心理学解释的性情和情境取向的分歧问题, 政治学路径还是心理学路径的平衡问题, 以及文化因素如何影响政治心理的问题。最后, 作者讨论了中国政治心理学研究如何看待文化差异问题、文化与理性的关系等问题。

关键词 政治心理学; 理性; 情境主义; 心理政治学; 文化研究

分类号 B849:C91

作为政治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 政治心理学诞生于一战与二战之间。从学科诞生至今, 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 政治心理学发展迅速, 已形成了良好的学科意识。McGuire (1993)将政治心理学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人格理论(精神分析学)研究, 六七十年代占主导的政治态度与投票行为研究, 八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认知、政治信念与决策研究。纵观不同历史发展时段, 我们可以总结出系列长期性的争辩议题和趋势: 其一, 政治心理学只研究非理性事态吗? 其二, 到底存在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政治心理学理论? 其三, 政治心理学如何处理心理与环境因素二者的作用? 其四, 政治心理学是归属于政治学还是心理学学科? 其五, 文化如何纳入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之中?

1 关于研究对象和学科意识的争辩

政治心理学的发展受到来自相关学科, 主要是主流政治科学的挑战。比如, 主流政治学理论中的制度主义、利益集团和政党利益解释理论,

强调政治结构和制度的约束, 认为人所处的政治场景而不是政治人的心理因素决定政治行为和政治发展(Monroe & Maher, 1995)。与此相对, 政治心理学最初是作为反理性解释而出现的, 因而政治心理因素成为了“非理性的”变量。更为宏观地看, 政治心理学学科内部关于学科整合与外部学科借鉴问题也有一些争辩。比如, 受到众多心理学理论的影响, 政治心理学学者对于借鉴何种心理学路径或理论也是众说纷纭, 这就造成了政治心理学采用的心理学路径繁多、概念层出不穷。

1.1 政治心理学只关注非理性吗?

政治心理学诞生于“一战”与“二战”之间, 首先受当时国际战争背景的影响, 它所关注的议题和内容就是一些“非理性”的问题, 诸如战争、冲突、政治暴力、政治冲动、法西斯主义, 等等。其次, 受当时心理学中“精神分析帝国主义”的影响, 精神分析学说和人格理论, 成为早期几位著名政治心理学学者的理论源泉, 比如 Lasswell (1930, 1948)和 Georges (1956)等。同样, 英国政治学者 Wallas (1908)在《政治中的人性》(如今被视为第一本政治心理学著作)一书中, 认为政治并不是我们传统所认为的由纯粹的理性所驱使, 而存在大量的政治非理性因素, 比如政治冲动、政治毁灭, 等等。

政治心理学长期关注非理性的政治行为研究, 还与政治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性研究传统有

收稿日期: 2011-01-28

^{*}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201007)和北京外国语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 (0502B07)。

通讯作者: 尹继武, E-mail: benyin109@163.com

关。在经典的政治理论思想家那里,不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霍布斯、卢梭,政治心理因素在其思想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政治科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心理因素是非理性的。坚持理性选择理论的政治学者借鉴了经济学家“经济人”假定的分析框架,假定政治人物也有类似经济人一样的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模式。比如,Downs (1957)在《民主的经济理论》中提出,“理性人”是排除了人的情感、动机、人格等心理因素,因为这些心理因素只有非理性的作用,无助于人的理性选择和决策。如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激发了很多研究运用“恐惧管理理论(TMT)”,分析死亡恐惧、道德等对于恐怖袭击的动机作用以及对于美国总统支持率和选举的影响(Pyszczynski, Solomon, & Greenberg, 2003)。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主流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都强调国家是一个理性行为体,它们追求自身的权力或安全最大化。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根据自身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决定自身的行为(Waltz, 1979)。但是,政治心理学认为,如果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决定了它的行为,那么如何解释伊拉克的萨达姆居然向美国挑战呢?领导人的人格、知觉等心理因素不可忽视,如果领导人出现了错误知觉,那么国家的行为就大大不同。在这一时期,政治心理学研究仍然是挑战主流的理性选择学说,强调人的知觉、情感和人格等因素会导致错误的判断和行为。

那么,政治心理学就真的只关注非理性的行为吗?冷战结束前后,政治心理学就开始重新思考这一议题,并展望了未来的重新研究理性之路。首先,政治心理学当然关注非理性因素,比如特定领导人的政治人格、种族灭绝、战争和偏见等等,但当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认知与决策研究,其基本的假定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认知心理学的基本前提是强调人的有限理性,即目标是理性的,但是受到人的有限认知能力、环境限制和信息不充分等制约,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比如认知偏差的产生(Jones, 1999)。有限理性研究强调政治认知和决策的各种偏差以及“认知捷径”,比如代表性启发式、可用性启发式和归因偏差等。在 McGuire (1993)所划分的第二和第三个政治心理学研究时期,政治投票、社会认知、政治信念和决策研究都是建立在 Simon (1985)有限理性假

定基础之上的。这一时期,政治心理学学者大量借鉴心理学中认知革命的成果,比如认知相符理论、认知失调理论、归因理论、预期理论等,认为政治世界中也存在大量的认知偏差,这些偏差会导致错误的政策和行为(石之瑜, 1999)。这就是政治心理学从非理性研究到有限理性研究的转向。

其次,政治心理学重新思考政治心理学与理性的关系。这是政治心理学第三个发展阶段,尤其是 2000 年以来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蒲晓宇, 2007)。比如,传统上我们认为情绪是一种非理性的因素,是理智的对立面。但是,情绪也具有传递战略信息、表达行为者的敏感点等作用。在“台海危机”中,中国政府的愤怒情绪就是向美国表达战略信息,让美国知道中国的战略底线。同时,最近情绪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情绪是理性的必要组成部分。换言之,如果一个人缺乏了情绪和情感的能力,那么他无法成为一个理性的人,所以情绪是有助于人做出正确的判断、决策和行为的(Damasio, 1994)。随着情绪与理性关系的重新界定,政治心理学界开始探究情绪和情感因素对于理性决策和行为的积极意义。比如,有些学者根据统计分析,认为恐惧会增加美国人对恐怖主义的知觉风险估计,因而会采取预防措施,而愤怒却与之相反(Lerner, Gonzalez, Small, & Fishhoff, 2003)。群体政治心理研究传统上探讨民族主义的非理性作用和机制,如关于族群中心主义、群际冲突理论的解释;如今很多研究关注群体心理的理性功能,比如群体信任等情感因素的培育,对于政治群体合作和冲突解决具有重要的意义,群体情感成为群体认同的基础(Rathbun, 2011; 尹继武, 2009)。总之,政治心理学研究早期重在非理性研究,到认知革命影响下为有限理性研究,以及如今与理性选择相结合。

1.2 有没有统一的政治心理学?

1977 年政治心理学国际学会成立,此后每年年会的会议规模、议题设置、讨论深度以及成员来源,见证了政治心理学学科的成长和成熟。来自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教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成员,构成了每届学会年会的与会主体。从这可以看出,政治心理学学科意识和认同已逐渐形成。《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杂志成为学科发展的

重要阵地，相继推出了众多专题，包括本文所讨论的政治心理学与政治经济学(1995 年)、政治心理学与“政治化”心理学(1994 年)、文化与政治心理学(1997 年)、神经科学对政治心理学的贡献(2003 年)、预期理论(1992、2004 年)等重要专题。先后推出了三种《政治心理学手册》，囊括了政治心理学学科的主要议题(Knutson, Ed., 1973; Hermann, Ed., 1986; Sears, Huddy, & Jervis, Eds., 2003)。凡此种种，皆表明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政治心理学已经初具规模，具有一定的学科意识和认同。然而，到底有没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心理学理论呢？

较之于政治科学中其他的主流分析工具，比如理性选择理论、制度分析学派等，政治心理学在分析工具的统一和共识方面略显不足。这一特点与心理学的特色紧密相关。首先，心理学的学派和分支学科众多，基本理论路径和应用领域都很丰富。政治心理学所运用和借鉴的心理学理论，直接来源于当时在心理学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比如，在政治心理学诞生初期，Lasswell 等代表人物主要吸取精神分析学说的营养；而后人格理论和心理传记学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吸收精神分析学说的理论。到 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随着心理学中认知革命的兴起，认知心理学成为政治心理学的主导分析工具，在投票和政治态度研究、政治认知和决策分析等领域莫不如此(Baars, 1986)。所以，各种认知偏差、认知机制以及随后的社会认知理论，成为主导的政治心理学理论。近 20 年来，随着情绪研究在西方心理学研究中的重新崛起，特别是情绪研究技术的发展(比如神经科学的发展)使得我们重新认识情绪与认知以及理性的关系，所以政治情绪的研究又成为新的宠儿(Marcus, Neuman, & MacKuen, 2000; Neuman, Marcus, Crigler, & Mackuen, Eds., 2007; 尹继武, 2009)，近几年《政治心理学》杂志也推出了多期情绪政治研究的专题。

可见，对于应用哪种心理学理论和分析工具，政治心理学并没有统一的共识，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心理学理论也不同。随着认知心理学逐渐“一统天下”，在“二战”前风靡一时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吸引力逐渐受到侵蚀，政治心理学研究中心理传记学和人格理论研究的关注度下降。由于受到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如今政治心理学中的认知学派

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认知学派内部，存在着诸多相近的概念，比如认知、知觉、意象、态度、图式(schema)、剧本(script)、偏差(bias)、归因、类比(analogy)等等，这些概念和路径的引入，固然说明心理学应用的扩大和繁荣，但由此也给人应接不暇的感觉(Young & Schafer, 1998; 张清敏, 2008)。政治学专业的初学者难以精确界定这些概念之间的细微差别。

在政治心理学内部，不同的分析路径和学派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似乎并不多见；更为常见的是，各持不同路径，基于不同的理论进行研究，成为宽泛意义上的“政治心理学路径”的一员。这一方面给人留下学科意识模糊的印象，另一方面也给研究带来了不少困难。比如，大量分散的心理学理论的应用，客观上影响了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创新。同时，根据科学哲学中成熟科学的标准，如果缺乏统一的、公认的主导分析理论工具或范式，那么这个学科仍是处于不成熟的发展阶段(Kuhn, 1962)。所以，未来政治心理学的发展，是继续坚持各自为战、寻找为我所用的心理学理论，还是必须相对集中、建设一种能获得大多数政治心理学学者认同的分析工具和范式(张平, 2004)，这仍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2 关于解释来源与学科借鉴的争辩

上述两个争辩主题涉及到政治心理学如何看待自身研究对象的性质和学科认同问题。在政治心理学内部，关于解释路径与学科借鉴方面，也存在诸多争议。典型表现为三个方面：以行为体的性情(dispositions)变量还是情境(situation)变量解释外在行为与结果？政治心理学研究中如何平衡“政治性”与“心理性”的问题？最后，随着文化心理学的兴盛，如何看待文化背景下政治心理的普适和独特规律之争？

2.1 性情主义还是情境主义？

人的性情，诸如人格、认知、动机或情感，塑造了人的行为，还是人所处的情境造就了特定的行为？政治哲学家 Arendt 提出了“恶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我们通常对法西斯主义分子的意象，是与诸如希特勒那样的恶魔相联系起来的。但是，事实上很多看来令人发指的恶行，却是由一些非常普通的人所执行的。那么，如何解释这些行为呢？到底是人的性情因素，还是情

境因素负主要责任？如果仅仅归咎于人的性情因素，那么如何解释犯下这些罪行的竟是些本性良善、再普通不过的庸常人？如果完全归咎于情境因素的话，那么似乎甚至连希特勒都可以得到宽恕。

上述争议构成了政治心理学理论体系和问题研究中一条长期的争辩主线。这种争议可以追溯到心理学本身。比如，社会心理学就有相似的两种不同路线，有的偏“心理”，有的偏“社会”。基于这种内在分野，Houghton (2009)指出，在行为主义、从众以及群体决策等领域，一直是情境主义(situationism)的解释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心理传记学、认知、情感和神经科学等领域，人的性情因素成为主要的解释工具。遵循上述区分逻辑，在诸如投票、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群体冲突和偏见、恐怖主义以及国际关系层次的应用中，都可以找到性情主义(dispositionism)和情境主义两种路线的坚持者。政治心理学的应用层次包括领袖政治心理、大众政治心理，以及国际政治心理；但是对于特定问题的解释，性情主义和情境主义的解释难以完全区分开来。比如，政治行为与决策，往往会有情境论的解释。近期较为著名的情境论观点是Zimbardo (2007)关于驻伊拉克美军虐囚丑闻的分析。在1971年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基础上，津巴多分析了平素“遵纪守法”的美国大兵为何做出令人发指、没有基本人权意识的虐囚行为的问题。对于这种好人如何变成恶魔的事件，Zimbardo提出了“路西法效应”的情境主义解释。

对于性情主义和情境主义两种解释路径，我们难以笼统地评判到底哪种解释更为有效，这取决于它们所要解释的特定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揭示在哪些条件下，个体及个体的性情可能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在情境的压力较小、情境较为新颖、信息不太充分或模糊等条件下，个体的性情可能会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Byman & Pollack, 2001)。

首先，当碰到较为新颖的情境，即一些非常规的局面时，个体的性情可能会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因为在这些新颖的情境中，决策者往常所依据的标准化或常规决策程序、手段和材料等都不能起到指导性作用，即没有习惯的思维定势、类似的情况可以类比，这时候就需要决策者个人

依据客观条件进行认知推理和选择。比如，“一战”结束后，正是由于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固执个性，他关于组织国际联盟的提案被国会否决，美国只得宣布退出国联。再如，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是美国遭受的重大国家安全危机，和美国本土首次遭受到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即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的袭击。相较于非危机或常规危机时期，在这种“非典型”危机决策中，小布什总统的个性及其认知和行为风格发挥的作用就相对较大。

其次，如果政府组织体系等级制特征明显，而且主要的领导人能够突破制度和官僚政治的限制，那么个体的性情所起的作用就比较大。这一特点在民主政治与威权政治的比较中表现得较为突出。比如，在民主制国家中，因为制度约束和利益集团政治影响较大，相对而言领导人的性情影响就小；而在威权政治社会中，对于某些享有很高社会威望的领导人来说，其个人色彩就能给该国的政治发展留下深深的烙印。

再次，当我们面对的情境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可采用的选择较多、信息较为充分却又模棱两可的时候，人的性情发挥作用的余地就较大。以最为常见的房子起火为例，在房子遭遇大火时，人们基本上都表现出相似的行为，即急于逃生。这是一个极端的个案，它表明情境的压力制约了所有性情的作用。但是，在现实的政治事务中很少出现类似房子起火的极端例子，大部分情况都是在不确定情境下需要作出选择和决策，这时主要发挥作用的是个人的性情，因而需要考虑其影响(Jervis, 1976)。

2.2 心理政治学还是政治心理学？

政治心理学是一门政治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学科，是研究政治现象和心理现象互动的学科。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学科归属、理论倾向和解释来源等方面，政治心理学到底是倾向于心理学一方，还是倾向于政治学一方？对这个问题，政治心理学界有不少争议：政治心理学倾向于进行各个层次的政治心理和行为研究，而心理政治学是运用心理学理论来分析并解释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袁振国，朱永新，1988)。具体来说，有学者认为现有的大部分研究，如人格政治、投票和态度研究，以及后来的认知和决策研究等，都更为符合心理政治学的名称(Krosnick, 2002; 季乃礼, 2009)。另有学者则指出，作为一门政治学的分支

学科, 现有的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政治性”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但前述的观点恰恰相反, 认为现有的政治心理学仍不是“标准的”心理学; 同样, 也有学者指出, 其实现有政治心理学的“政治性”关怀始终存在, 只是对于政治学和心理学双方的贡献都不是特别突出。

认为现有的政治心理学研究更多地符合心理政治学的观点, 其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从“政治心理学”术语出发, 认为它是与“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平行的一门心理学的子学科。在 Gerrig 和 Zimbardo (2002) 看来, 心理学试图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为“人性是什么”。但是, 现有的政治心理学更多的是将心理学理论和视角应用于政治问题的分析, 所以其根本的出发点在于解释政治问题, 诸如总统行为、政治决策、投票和族群冲突等等。

再者, 在政治学和心理学学科中, 政治心理学受到的关注程度是不对等的。比如, 每年俄亥俄州立大学举办的政治心理学暑期班中, 大部分学员都是政治学系的学生, 而少有来自心理学系的学生; 政治心理学的学者较多是来自政治学的学科背景和训练, 而少有来自心理学系的背景; 政治心理学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基本上集中于欧美大学政治学系, 而不是心理学系; 大部分政治心理学学者都在政治学的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 而较少在心理学的专业期刊发表论文, 这说明他们的对话对象是政治学专业的师生。基于种种理由, 不少学者认为“政治心理学”其实名不副实, 而“心理政治学”更为恰当(Krosnick, 2002)。

与上述观点相反, 有学者指出, 现有的政治心理学的“政治性”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首先, 在公众和群体层次研究中, 对于大众和群体政治心理中政治精英的作用研究不够; 其次, 现有的政治心理学将分析对象主要集中于个体身上; 再次, 当我们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政治问题时, 可能会面临政治理论并没有很好地与心理学模型相结合的问题, 并且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的分析中, 心理学的运用及其功效并不是特别显著(Rahn, Sullivan, & Rudolph, 2002; Luskin, 2002)。当然, 针对上述批评, 一些捍卫政治心理学“政治性”的学者指出, 其实政治心理学的人格分析以及认知学派, 都将精英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而公众舆论研究中精英的作用也没有被忽视。更进一步, 他们提出, 尽管对于何谓“政治”与“政治问

题”存在不少分歧, 但是一些根本性的“政治问题”, 比如权力、冲突和治理(决策与合法性)问题, 一直都是政治心理学分析中的核心问题和解释对象(Rahn et al., 2002)。

权力是政治分析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政治心理学关注权力的心理基础: 如何使用影响力手段、达到影响对方的目的, 如何使用武力、政治领导人如何进行政治动员, 等等。Lasswell (1948) 就曾探讨过权力与人格之间的关系。解释冲突的心理起源及其消解, 是政治心理学的核心命题之一。政治心理学早期是以反理性解释的面目出现的, 所以, 冲突作为非理性的行为及结果, 自然成为政治心理学解释的对象, 比如“911”恐怖事件后对恐怖主义的“恐惧管理理论”研究(Pyszczynski et al., 2003)。政治心理学关于治理的研究可以分为精英决策以及合法性的研究。决策研究是政治心理学中认知学派的主要内容之一, 而在合法性研究中, 公众的公平感等也是影响政府合法性及治理的重要因素。所以, 政治心理学的“政治性”不强的理由不是很充分(Rahn et al., 2002)。

综上所述, 关于政治性与心理性的平衡问题, 在政治心理学学者内部还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政治心理学研究也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 首先是仅仅将心理学理论拿过来分析政治问题; 其次是更为系统地运用心理学模型进行政治分析; 最后是不仅仅系统地运用心理学理论进行政治分析, 而且还试图修正和发展已有的理论(包括心理学和政治学理论)。

2.3 文化如何影响政治心理?

政治心理学从学科诞生之时, 就与文化因素紧密相连。这首先是由于政治心理学与文化人类学、心理文化学等学科紧密相关。比如, 在美国人类学家进行的日本国民性的研究《菊与刀》中, 菊花和刀成为日本国民文化性格的形象表达(Benedict, 1946)。许烺光的《美国人与中国人》就是比较中美国民性的经典著作(Hsu, 1981)。这些著作并非是政治心理学研究, 但是它们成为文化政治心理分析的重要理论源泉。精神分析学说以及人格理论都强调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但是, 随着行为学派和认知革命的兴起, 文化因素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反而认知机制和规律的普适性观点成为主流的看法。从现实来看, 美国成为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阵地, 而美国问题

(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成为经典政治心理学分析的主要对象,比如,政治人格研究基本上局限于美国总统,较少涉及其他国家的领袖;投票和态度研究基本上是以美国国内政治为样本,政治认知和决策研究也莫不如此。又如在政治心理学理论来源之一的社会心理学中,欧陆的社会心理学的成果引介较少,而美国主流的实验社会心理学成为主要的理论工具。尽管从学科诞生之初来看,政治心理学的理论源头来源于欧洲大陆,即来源于精神分析学说大师弗洛伊德和弗洛姆等人(Freud, 1930; Fromm, 1941)。

当然,如今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文化差异问题。Renshon 曾经主持了《政治心理学》杂志的“文化与政治心理”专题,随后他又主编了“政治心理学的文化视角”的著作(Renshon & Duckitt, Eds., 2000; Roazen, 2003)。强调文化差异的政治心理学研究认为,文化差别体现为思维和行为层面的差别,而不仅仅是外在物质的差别。此外,一些文化心理学家也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层面的文化差异研究。比如, Nisbett (2003)和彭凯平研究了东方和西方社会的认知和思维差异问题。Nisbett 在《思维的版图》中,详细分析了东西方社会的思维差异。比如,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讲的东方社会是集体主义,而西方社会是个体主义的。在他的分析中,西方人只看见树木,而东方人看见的是整个森林;东方人观察事物的视角更多的基于事物间的关系,而西方人更多的是基于事物间的属性。这些思维和认知差异,在政治事务中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文化如何影响东西方社会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心理,以及对于权力和权利的认识?进而,思维和认知差异是否成为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比如中美——打交道时众多误解的来源之一?上述文化认知差异解释可以成为传统的国家利益解释的一种补充。比如,在中美危机处理过程中,对于危机性质的判定双方就存在文化差异,美国人更偏重技术细节,而中国更注重危机的性质和关系判定(Gries & Peng, 2002)。

文化差异是否成为政治心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影响变量?对此,政治心理学学者存在一定的分歧。上文所述均为强调文化差异重要性的观点。但有部分学者认为,现有文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可能部分地夸大了不同文化体系中思维和行为差异的程度。这种观点认为文化差异会影响政治心

理特性,但是关键在于如何界定文化差异的程度问题。社会学家 Goffman (1967)提出,文化差别表象的背后,人类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的属性,文化的差异更多的是人性的构成要素在组合方式上的差异,而不是根本性的差异。他的研究对中国本土心理学中的中国人独特的“面子”概念提出了挑战(翟学伟, 2011)。Goffman 认为面子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交通规则”,只不过中国人更为注重面子而已。比如,美国对外战略中就有不少面子和威望的追求因素。

政治心理学界中的文化政治心理分析仍有不足之处。比如,少数跨文化比较研究大都局限于几个地区或国家,如日本、东欧、南美和土耳其等。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获取资料等研究技术方面较为便利,但它们仍不是完整的,也不具备广泛的代表性。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五千年文化和文明传统的中国却极少进入欧美政治心理学家分析的视野。这是中国政治心理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比如,可以针对中西心理规律与思维差异开展具体的比较研究并应用于政治分析,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归因方式存在差异,中国人可能具有情境归因的倾向,而不是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的性情归因(杜林致, 2006);进一步而言,文化差异主要来自对归因过程中先置概率和倾向概率的判断,而不是效能概率(彭凯平, 廖江群, 2009)。在文化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上,秦亚青(2009)提出西方个体本位的社会性质的核心理念是“理性”,而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根本理念是“关系”,他进一步提出“关系性”(relationality)的核心概念,并建构一种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忽视的“过程建构主义”(process constructivism)研究范式。当然,必须注意的是,跨文化心理学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对于政治心理的影响到底是本质差异,还是程度差异,这并没有取得共识。

3 结束语

就我们所总结的五个争辩议题来说,它们涉及对政治心理学研究对象性质的看法、政治心理与情境解释的关系、政治学与心理学路径的平衡问题、政治心理的主导分析理论问题以及政治心理的普适性和独特性问题。我们可以预期至少在很长时期内,各种不同的声音会长期共存,因为它们关涉的是不同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的诸多分

歧问题。当前美国政治心理学的发展,在上述宏观争辩背景下走向更为细致的实验政治心理学研究。比如,在决策政治心理研究中,关于启发式的研究具体讨论各种启发式如何影响选民的决策。Lau 和 Redlwask (2001)质疑了认知“启发式”增强了选民的决策能力的传统观点。情商(AI)理论认为,在民主政治中,情绪影响甚至决定选民对候选人的偏好和判断,但很多学者认为这种观点没有得到广泛的检验(Wang, 2008; Bower, 2008; Ladd & Lenz, 2011)。

中国政治心理学学科的发展,不能忽视中国文化和中国特性,为此,文化政治心理学的路径应是方向之一。一方面,基于文化差异的前提,我们可以提出不同于西方政治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和解释逻辑,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因素的引入,也可以进一步重构西方政治学分析中的一些核心概念,比如上文所述的理性概念,以及权力、利益、认同、国家等概念。当然,正如上文所述,关于文化差异的性质问题,必须注意不同方面的意见。所以,基于西方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和逻辑,进行中国政治心理学分析也是十分重要的。在这方面,中国社会心理学所兴起的本土社会心理学运动及其取得的成就值得中国政治心理学者借鉴和反思。

参考文献

- 杜林致. (2006). *归因与文化: 分析成败原因, 预测行为模式*.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季乃礼. (2009). 政治心理学发展中需要澄清的几点问题. *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3(3), 110-113.
- 彭凯平, 廖江群. (2009). 文化与归因的过程模式及概率模型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 (6), 31-40.
- 蒲晓宇. (2007). 政治心理学. 见 华世平(编), *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 政治学* (pp. 108-205).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秦亚青. (2009). 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 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 (3), 69-86.
- 石之瑜. (1999). *政治心理学*.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 尹继武. (2009). *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袁振国, 朱永新. (1988). 政治心理学和心理政治学. *政治学研究*, (5), 68-70.
- 翟学伟. (2011). *中国人的脸面观*.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张平. (2004). 国外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心理科学*, 27(6), 1467-1469.
- 张清敏. (2008). 国际政治心理学流派评析. *国际政治科学*, (3), 71-101.
- Baars, B. J. (1986).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in psychology*.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Benedict, R. (1946).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Cambridge: Houghton Mifflin.
- Bower, B. (2008). Simpleminded voters. *Science News*, 174(1), 22-25.
- Byman, D. L., & Pollack, K. M. (2001). Let us now praise great man: Bringing the statesman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4), 107-146.
- Damasio, A. R. (1994).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New York: Putnam.
- Downs, A.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Shaper.
- Freud, S. (1930).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Jonathan Cape & Harrison Smith.
- Fromm, E. (1941).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 George, A. L., & George, J. L. (1956). *Woodrow Wilson and Colonel House: A personality study*. New York: J. Day Co.
- Gerrig, R. J., & Zimbardo, P. G. (2002). *Psychology and life* (16th ed.). Boston: Allynand Bacon.
- Goffman, E. (1967). *Interaction ritua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Gries, P. H., & Peng, K. P. (2002). Culture clash? Apologies East and Wes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1(3), 173-178.
- Hermann, M. G. (Ed.). (1986). *Political Psychology: Contemporary problems and issu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 Houghton, D. P. (2009). *Political Psychology: Situations, individuals, and cas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Hsu, F. L. K. (1981). *Americans and Chinese: Passages to differences* (3rd ed.).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Jervis, R. (1976).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ones, B. D. (1999). Bounded rationalit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 297-321.
- Knutson, J. N. (Ed.). (1973).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Krosnick, J. A. (2002). Is political psychology sufficiently psychological? Distinguish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from psychological political science. In J. H. Kuklinski (Ed.), *Thinking about Political Psychology* (pp. 187-216).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dd, J. M., & Lenz, G. S. (2011). Does anxiety improve voter's decision mak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32(2), 347-361.

- Lasswell, H. D. (1930).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sswell, H. D. (1948). *Power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 Lau, R. R., & Redlawsk, D. P. (2001).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ognitive heuristics in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5(4), 951–971.
- Lerner, J. S., Gonzalez, R. M., Small, D. A., & Fishhoff, B. (2003). Effects of fear and anger on perceived risks of terrorism: A national field experiment.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 144–150.
- Luskin, R. C. (2002). Political Psychology, political behavior, and politics: Questions of aggregation, causal distance, and taste. In J. H. Kuklinski (Ed.), *Thinking about Political Psychology* (pp. 217–25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cus, G. E., Neuman, W. R., & MacKuen, M. (2000). *Affective intelligence and political judg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cGuire, W. J. (1993). The poly-psy relationship: Three phases of a long affair. In S. Iyengar & W. J. McGuire (Eds.), *Exploration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pp. 9–35).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onroe, K. R., & Maher, K. H. (1995). Psychology and rational actor theory. *Political Psychology*, 16(1), 1–21.
- Neuman, W. R., Marcus, G. E., Crigler, A. N., & Mackuen, M. (Eds.). (2007). *The affect effect: Dynamics of emotion in political thinking and behavior*.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isbett, R. (2003).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 and why*. New York: Free Press.
- Pyszczynski, T. A., Solomon, S., & Greenberg, J. (2003). *In the wake of 9/11: The psychology of terror*.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Rahn, W. M., Sullivan, J. L., & Rudolph, T. J. (2002).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J. H. Kuklinski (Ed.), *Thinking about Political Psychology* (pp. 155–186).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thbun, B. C. (2011). Before hegemony: Generalized trust and the creation and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5(2), 243–273.
- Renshon, S., & Duckitt, J. (Eds.). (2000). *Political Psychology: Cultural and cross-cultural foundation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Roazen, P. (2003).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Sears, D. O., Huddy, L., & Jervis, R. (Eds.). (2003).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mon, H. A. (1985).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The dialogue of psychology with political scien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9(2), 293–304.
- Wallas, G. (1908).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London: Archibald Constable & Co.
- Waltz, K.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 Wang, X. T. (2008). Decision heuristics as predictors of public choice.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1, 77–89.
- Young, M. D., & Schafer, M. (1998). Is there method in our madness? Ways of assessing 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42(1), 63–96.
- Zimbardo, P. (2007). *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 New York: Random House.

A Review of Debates within Political Psychology

YIN Ji-Wu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Bringing together political science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 Political Psychology has long been a source of interdisciplinary advances. Issues of debate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theory inclu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ationality and the variables proposed by political psychology, the domain paradigm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or the decentralization problem, the selection problems of dispositionism and situationism, the balance problem of balance between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approaches, and the problem of how cultural variables influence variables of interest to political psychology. This author discusses in detail the controversies above and further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cultural approach of Chinese political psychology research, such as focusing on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rationality.

Key words: Political Psychology; rationality; situationism; Psychological Political Science; culture studies